

北京古近代农村经济

◎ 张一帆 孙素芬 编著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古近代农村经济

◎ 张一帆 孙素芬 编著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古近代农村经济 / 张一帆, 孙素芬编著.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5116 - 2159 - 7

I . ①北… II . ①张… ②孙… III . ①地方农业经济 - 农业经济史 - 研究 - 北京市 - 古代 ②地方农业经济 - 农业经济史 - 研究 - 北京市 - 近代 IV . ①F32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4903 号

责任编辑 徐 肖

责任校对 马广洋

出版者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010)82106631(编辑室) (010)82109704(发行部)

(010)82109709(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82106631

网 址 <http://www.castp.cn>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 25

字 数 4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 00 元

《北京古近代农村经济》

编写人员

主编 张一帆 孙素芬

副主编 张峻峰 孟鹤 龚晶

编者 赵姜 郑怀国 罗长寿 赵静娟

撰稿 张一帆

前 言

“以史为镜”，“继古开今”，做好“中国梦”，把北京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

北京地区地域不大（至今也只 16 807 平方千米），但却是一块风水宝地——山山相交构成形势美丽的“北京湾”，这里是山、水、平原俱全，四季分明，“北京人”的发祥地；这里自古天地人和在变迁中相得益彰，被学界称之为“人类文明的东方源头”——“北京人”及其后生们在劳动中创造了自己，并历经了从猿到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全过程；从洞穴群居、采集渔猎为生转为建村创业到开创城乡经济文明，至今已近万年。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勤劳、创新、造物的精神与意志，在“北京”这块地域内生息繁衍，生生不息地在创造着自我人生的同时，在改造、呵护着自然，开创着人类历经的完整的城市郊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轨迹与文明系列，使这里成为 5 000 年前黄帝部落最初立国，邑于涿鹿的活动中心区，进行“艺五种、抚万民，渡四方”，开创了“中国北方农业的源头”；这里经历了由农业村落演化成方国都城、中国北方军事重镇和国家首都及由农村经济文明萌发并发展出城市文明。在这个近 3 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北京地区由广阔的农村大地与村域经济逐渐分离出城市与城市经济。城镇与城市的出现与发展壮大，既呈现出城乡分割又呈现出相互依赖的城乡关系。由于农业永远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之源，因此自古以来北京城郊的农业以及农村经济供养或服务城市就形成“天赐我也”的职能与义务，并在不断完善和提升供养或服务中促进郊区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创新、发展，以致形成与一般地区农业、农村经济相比既存同一性，亦显特色——“城郊型”——在古近代，这里农民经营的已不是单纯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他们在追求自身温饱中还得关顾城市的需求，甚至为了供给城市或自身利益的追求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奉献。长此以往，北京农业和农村经济就铸就竞显“服务首都，富裕农民”的双重功能特色与风貌。因此，回顾与书写已离去致远的北京古近代农村经济对于当今做好“中国梦、我的梦”，“继古开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具有激励奋进的借鉴意义。

历史悠久上万年，从哪上手，从何处捕捉祖宗业绩？有识人士语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我们从古往今来“巨人”笔墨留迹的文海中撷凝出晶莹剔透的前人智慧与业绩，让我这个历史“愚者”有所得，并“积沙成塔”再造纸面上的北京古近代农村经济，或属愚作，但愿能给今人一点星光神韵！愚者一得，但在再造中或有一失，望读者斧正！

本书对古近代北京农村经济发生与发展的阶段性划分不是以社会发展中的朝代确定，而是以马克思所指出的“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确定。迄今为止，社会经济（生产）经历了 3 次大的技术革命，都以生产工具的变革为起点，而生产工具的变革又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自古以来一切生产工具都是“物化”了的科学。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

的。新石器的出现使人类实现了第一次农业革命，世界上出现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铁器的发明与应用使农村、农业生产力出现第二次飞跃，进入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机器和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与农业出现第三次腾飞，进入现代化的集约经营。由此，笔者认为以生产工具的变革为起点来标定“古近代北京农村经济”的框架，更贴切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天、地、人”，天时、地利、人和是经营和发展农村经济的“三才观”（荀子语）。悠悠上万年的农村经济史，历朝历代都存在“顺天时，量地利”，促人和的问题。这“三才”既有纵向系统问题，亦有横向阶段（朝代）性问题，纵例横写如何纵、横兼顾？笔者在北京古近代农村经济的著作中对10个事关全局的纵向问题，独列一章作出系统的记述与评论，旨在使读者在领略局部的同时通观全局脉络。如横观每朝每代农村经济都存在兴与衰的事实，呈现波动式态势，是否是封建王朝的经济运行规律？纵向系统观之则一目了然，——战争、灾荒、王朝的兴衰史造成封建时代经济兴衰波动的根源所在，凡此，都是笔者写作中的一种尝试，望请读者赐教！

在撰稿中涉猎古近代的经济思想，有的比西方要早一两千年，这对于那种“言必谈希腊”者可能会有所启示；还涉猎古代文人过目与领略北京农业的诗文及散落在一些非农典籍中的断语、图像等。为便于读者系统了解，遂将其单独整理成文附后，以作正文的补充。

在书稿征求意见中有提示到古近代北京农村经济涉及的人口、耕地面积及人均占有、相关经济计量单位、亩产量等；还有建议适当插图等。为不失建议失望，亦搜集整理出相关资料附后，供读者参考。

作者

2014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北京农村的地域、环境与资源	1
第一节 北京的渊源及郊区的界定与演进	1
第二节 郊区生态环境	6
第三节 丰厚的自然资源	10
第二章 农村经济发展中几个全局性问题	15
第一节 古近代京畿社会形态与土地制度	15
第二节 地主封建制社会的土地制度与经济波动	20
第三节 封建社会的剥削是制约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桎梏	23
第四节 京畿农村经济的命脉与源流	28
第五节 北京农业的使命与特色	43
第六节 古代农业灾荒及社会救助	52
第七节 水利是北京农业发展的“龙脉”所在	55
第八节 古近代北京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科技进步	59
第九节 京郊小农经济及其商业化演进	65
第十节 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福祉	74
第三章 石器时代的北京地区原始公社经济	76
第一节 采集与渔猎经济——旧石器时期（距今 200 万 ~100 万年）	76
第二节 原始农业经济——新石器时期（距今约 1 万年）	79
第三节 原始公社与原始公社制	88
第四章 青铜文化时代的北京农村经济	91
第一节 夏商时期的北京农村经济（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027 年）	91
第二节 周代的北京农村经济（公元前 1027 年至前 771 年）	95
第五章 铁器时代的北京农村经济（战国时期——清·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	100
第一节 战国时期的农村经济（公元前 770 至前 221 年）	100
第二节 秦汉时期燕地农村经济（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190 年）	107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京农村经济（公元 190—589 年）	113

第四节	隋唐时期的北京农村经济（公元 581—954 年）	121
第五节	辽金元时期的北京农村经济（公元 936—1367 年）	128
第六节	明及清前期的北京农村经济（公元 1368—1840 年）	152
第六章	机器与近代科技时代的北京农村经济	183
第一节	清后期北京的农村经济（公元 1840—1910 年）	186
第二节	近代民国时期京郊农村经济（公元 1911—1949 年）	196
附 录		
附 1	我国古代的农村经济思想	212
一、伟人有关论语	212	
二、关于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深远意义	215	
三、关于古代的农本思想	216	
四、农民是农村经济的创造者和振兴者	231	
五、古代农业的经营之道	240	
六、封建王朝“开明”与地主剥削的秘密——在捞取农业生产中的剩余价值	244	
附 2	北京农村经济史料钩沉	246
附 3	古人咏北京农业	256
附 4	古近代北京农村经济图例	261
附 5	北京古近代农村经济要素的演进	300
一、农业生产要素的演进	300	
二、手工业的演变	303	
三、主要商业活动的演变	303	
四、古近代北京地区人口的变迁	304	
附 6	古近代北京农村经济的参量资料	305
一、古近代北京农村经济参量资料	305	
二、我国粟、麦历史亩产变化情况	307	
三、各代粮食亩产数字的估算	310	
四、各代每人平均粮食耕地面积和粮食占有量的估算	310	
参考文献	312	

第一章 北京农村的地域、环境与资源

地域、环境与资源是农村经济发生与发展的基础，也是探索与阐述农村经济史的格式框圈。

第一节 北京的渊源及郊区的界定与演进

一、北京地区的沧桑巨变与渊源

《科技日报》（2007年6月28日）以“北京地区曾是一片汪洋大海？”为题写道：“目前，考古发掘的蓝藻化石却证明了这点。”其论据是：“蓝藻是海洋特有的物种，发现的这一蓝藻化石距今约有10亿年，由此，专家得出在远古代（25亿年前至6亿年前）北京地区曾是一片汪洋大海的结论。”余钊《北京旧事》：直至“二三百万年前的北京地区，还是一个海湾”。

文中还指出：“后来，现在的北京地区附近遭遇剧烈的造山运动，即‘燕山运动’，强烈的地壳运动及火山喷发使燕山和太行山逐渐隆起，北京地区也形成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貌格局。永定河携带着大量泥沙，穿山切谷奔流而下。在漫长的岁月里，泥沙填平了太行山与燕山之间的古海湾，形成了如今的‘北京小平原’”。

《北京史》中写道：“在北京人的时代，北京地区的地形基本和现在一样。”而在二三百万年前的北京地区，还是一个海湾，湛蓝的海水在这里荡漾。其北为燕山山脉、西为太行山山脉接邻。后经地壳变动，海底升起，海水东流，填平两山交会东南的海而形成了华北平原的最北面的这片土地。其地形是“负山带海，龙盘虎踞”（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

据史料记载：北京城的原始聚落名曰蓟（可谓乳名），曾是殷商北方属国都城，在夏、商、周三代，北京地区属幽州。西周初年（公元前1045年或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之后，即封黄帝后人于蓟，稍后又封召奭于燕。蓟国都蓟城，燕国都燕（即房山董家村附近）。大约于西周中后期，燕灭蓟，迁都于蓟（现广安门一带）。到春秋战国时期，蓟城为燕国都城，时有“渤碣之间一都会”；到两汉至隋唐期间，蓟城一直为州郡（国）治所，并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辽建陪都于幽州，蓟城改名南京又曰燕京；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城后，改号中都；元改称大都；明初改元大都为北平，至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为北京；清顺治定鼎北京，沿用北京之名。1928年6月，“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后，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并旋改北平市；日伪占领时期改北平市为北京；抗战胜利后复改称北平市，1949年9月21—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改北平为北京，并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对于北京的历史年头，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经考证，认为以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蓟的年代作为蓟城建城之始的论点，认定至公元1995年蓟城（即北京）建城3040年；二是韩光辉先生在《从幽燕都会到中华国都》一书中认为商代至少是商代中期即以蓟为都，北京的历史大约有3500年。在这漫长的时段中不论是古代的蓟城还是演变而今的北京虽然其基点方位有所变迁，规模不断扩大，但都在现行辖区内。

鉴于北京的由来只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方国都会（城）到国家首都，除规模的扩张、性质的攀升与地位的显要和名称多变更外，并无质的歧见。因此，本书谈古论今皆以北京相称，至于特定史实可从实处理。

二、郊区的界定

关于北京农村的界定尚未见有史论，但见有郊区和村庄一说。《周礼·地官·载师》，《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载道：西周时期已有“邑外为郊，离城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和“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有研究认为今日北京城市郊区是经历漫长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从燕都蓟城至金中都期间尚处于城郊状态，其间曾为原始聚落，名蓟。至西周时为蓟国都城。春秋战国时期为燕国都城。到辽金及元代逐渐形成具有明确行政界线的城市郊区，并保持相对稳定。直到元代仍沿用“城郊”概念。《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大都）各城门外都有一个城郊，范围扩大，和左右两边城门的近城，连成一片。所以它的长度延伸六七公里之远，因而近城居民的人数超过了都城的居民数。”在元大都的近郊不仅建有许多坛庙寺观、别墅苑囿，还建有粮仓、窑场，设有采木提举司和养种园等。因此，韩光辉在《从幽燕都会到中华国都》（商务印书馆，2011年）一书中写道：“可以说北京城市郊区在元大都时已初步形成了。”到了明代则显现“城内地方以坊为纲”，而“城外各村，随地方远近，分为若干保甲”。这时城市与村庄编设坊铺和保甲有明显的区别，表明坊、村已成城内外（郊）基层的社会管理单元或不同的经济功能体。元朝政府在北方乡村普遍推行村社机构。元初，北方民间组织起“锄社”开展农户间互助农活。后来，元政府在其基础上加以整顿，发展成村社组织。政府规定：“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元史·食货志》《农桑》）。

利用村社制度重新编制劳动力，即使农村分散的农户形成互助组织，又利用集体联合的力量解决了农业劳动力缺乏的问题，这可是元朝政府重农扶农的一大幸事。到清代，至雍正十一年（公元1734年），清政府明确规定：“嗣后悉照京营旧制，凡城属地方，有越出京营界外者，就近各归大（兴）、宛（平）二县管辖；大、宛二县地方，有夹杂京营界内者，就近各归四城管辖各按界址，竖立石碑，永远遵守。”这一规定进一步具体划定了北京城市郊区与大、宛二属县之间的行政界线。到“民国”3年（1914年）设京兆辖通县，大兴、宛平、良乡、房山、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等20个县，“地方数百里，人民数百万”（《治理京兆计划书》第一章《概论》）。由此，北京市的郊区大为扩大，并形成县、乡、村的行政管理体制。有材料证明，民国时期，北京城市郊区不仅保持着与城市生活的密切关系，而且开始了自我完善与展现特殊功能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北京

城市郊区经历 1949 年、1956 年和 1958 年的几次扩大与发展，形成了今日的市域。到 2012 年，包括有 4 个近郊区和 10 个远郊区（县），182 个乡镇、3 944 个村、2 159 501 个村户、5 894 277 乡村人口、3 477 777 乡村从业人口，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郊区（县）、乡（镇）、村行政管理体系。

现今北京国土面积 16 807 平方千米，其中，农村面积为 16 719.9 平方千米，农业人口 373.4 万人。就古今而言，农村者即以农为本之人居地域也。城郊农村者即城市所辖而处城外以农为本之人居之地域也。人们在这块地域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产生的价值与效益总和称为农村经济。这就是本书遵循的框架范围。

三、北京地域框架的演进

（一）“北京人”时代的地域轨迹

人类的诞生大约已有二百多万年的历史。

举世公认的“北京人”大约 50 万年前发祥于房山区周口店地区，他们“是原始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 年）。据对 40 多个个体的研究表明，他们的体质和外形已经同现代人差不多。他们主要用右手进行劳动，能自由直立行走，脑量均为现代人的 80%。已经有了简单的语言和思维能力。他们居住在周口店龙骨山北坡的山洞中，那里遗存着他们的骸骨化石，使用过的石器工具，用火的灰烬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以及植物遗迹等。“北京人”所处的时代，在人类经济文化史上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 年）。

据古人类学家研究认为，人类最直接的祖先是生活在距今 1 400 多万年的拉玛古猿。在我国云南省的开远县和禄丰县，都已发现了拉玛古猿化石。据考证，拉玛古猿已能直立行走，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来猎取食物但还不会制造工具，到距今二三百万年以前，才出现了会制造（打制）工具的“猿人”。在我国已发掘出来的猿人化石有云南元谋县的“元谋人”，距今约 170 万年；有陕西的“蓝田人”，距今约 85 万年；有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北京猿人”，距今约 50 万年以上。徐自强先生研究认为，“北京猿人很可能就是从我国中原地带来的，他们到北京地区以后，以周口店一带依山傍水为家，逐渐地开发着华北原野，并留下了‘山顶人’、‘东胡林人’、‘转年人’等后代，使其成为北京新石器时代雪山文化等的创造者。”

大约距今 20 万年前，同地由“猿人”进化成早期智人——“新洞人”（1973 年发现）（俞钊《北京旧事》，学苑出版社，2005 年：1）。

大约距今 2 万年前，在“北京人”、“新洞人”同居的一座小山洞里出现“山顶洞人”，他们属于晚期智人，其体质特征已与现代人没有什么差别（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 年）。

大约距今近 2.5 万年前的“王府井人”在 1996 年王府井东方广场施工中被发现。这里有距今近 2.5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据说，在一个国家首都的城市中心，发现两万多年前的古人类活动遗址，这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王东等《北京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大约距今 1 万年前，“北京人”的后裔已迁徙到门头沟区斋堂地区的东胡林村。北京

大学学生分别于 1966 年发掘到 3 具东胡林人遗体，2003 年发掘到 1 具直肢葬遗骨，2005 年，又发掘出 1 具屈肢葬遗骨。据年代测定距今 1 万年前，属于新石器早期（王东等语）。

在怀柔宝山寺镇转年村西、白河岸边的二级阶地上发现距今 1 万年的文化堆积，其面积 5 000 平方米，出土遗物 18 000 件，其中，包括标志着新石器磨制技术的磨光石器（王东等《北京魅力》）。

平谷上宅遗址，距今 6 500 ~ 7 500 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坐落在燕山南麓、泃河北岸二级台地上。

基于房山周口店是“北京人”的发祥地，那么上列人类演进系列遗址当是“北京人”的后裔们迁徙所为。从已发掘到的“北京人”后生遗址几乎遍布京郊 14 个区县，星罗棋布，分布很广，海淀区中关村、朝阳区立水桥都曾发现细石器。昌平县马坊、林场，密云县燕落寨都发现了属于仰韶时代的遗址、遗物。昌平县燕丹、曹碾还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的遗址、遗物。昌平县雪山村的古代文化遗址，典型地代表了上自仰韶时代，中经龙山时代，下迄商周时代的基本线索。在西郊的西山，西南的房山，东南的通县，东面的平谷，东北的怀柔—密云，北面的昌平、中间的顺义，以及地处塞外的延庆，都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铲、石凿以及石纺轮等文化遗物，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表明：一是现今北京地区的行政区域内的 16 个区、县在远古时期已居住着、繁衍着“北京人”的后裔；二是 5 000 ~ 10 000 年时期，北京居民已经不是原始的猎人或采集者，他们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这些原始先民们，依靠氏族公社集体的力量，使用原始的木、石工具，进行刀耕火种式的农业，过着原始的定居生活。表明北京地区的居民已经走到了历史文明时代的人口处了。就人类人文地理习俗而言，无论古代先民（“北京人”）们如何迁徙扩散，总会留有传宗的“根”。

也无论古代“北京人”如何迁徙扩散和原居民所居地域在行政管辖中如何规划，上述古代文化遗址所在地域与今日的北京地域，几乎相重的人地文化仍是一脉相承，只是在推陈出新罢了。

（二）黄帝及其后裔建立的方国蓟都迁徙、转移轨迹

史书《礼记·乐记》记道：“（周）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据李江浙《蓟城史前初探》，蓟的来源与黄帝部落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北京及附近地区的早期居民主要是黄帝之子禹京之后，也就是兼营稻作和渔业的蓟族。而蓟族长期生聚中心的丘岗就称之为“蓟丘”之名。从古史传说及考古发现都表明，黄帝本人的活动地域及其后裔建立的奴隶制方国蓟都，都曾发生过迁徙与转移，如今在北京的紧邻河北省涿鹿及北京延庆、平谷等地都有黄帝或其后裔的足迹。王东等在《北京魅力》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中讲道：“直至 3 000 年前武王分封的西周时代。黄帝部落最初立国的主要中心区域在‘蓟’——北京地区还是人们共知的基本事实”，“甚至直至 2 000 年前司马迁作《史记》的汉代，黄帝部落最初立国的主要中心区域在‘蓟’——北京地区仍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刘玉奎《新增都门纪略》称都城以北百余里有“蓟丘”，当是黄帝及其子禹京后裔最初生息繁衍中心地——昌平雪山村之台地。到了商代中期以后，蓟人活动中心开始转移到永定河洪积冲积扇上，并在这里形成了蓟丘、蓟水、蓟等地名。

据史料记载，黄帝及其子禹京后代最初生息繁衍中心，当在昌平区雪山村台地上，一般是指傍水海拔 50~100 米高地。这个台地当是北京地区最早的蓟丘。在此形成的原始聚落或即称为蓟；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奴隶制小国蓟。至殷商时期臣属商朝，为一宾服方国，即为刘玉奎《新增都门纪略》所称都城以北百余里有“蓟丘”之谓。从一些史书记载看，黄帝是古代北方崛起的强大的氏族部落的祖先。该部落中各氏族“往来迁徙无常处”。古史传说黄帝本人的活动地域及其后裔建立的奴隶制方国蓟都曾发生过迁徙与转移，古代在北京城西和昌平西部都有蓟丘地名，在北京西郊又有蓟水等。黄帝“以师兵为营卫”进行南征北战，与东部的九黎部落和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不断发生武力冲突。先是与炎帝部落结盟，击败了九黎部落，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打败了炎帝部落后在涿鹿建立了都邑。传说黄帝第三代继承者颛顼，曾到“幽陵”祭祀。“幽陵”即是幽州，是北京最早的名字。帝尧时，也在幽州建立过最初的都邑，称为“幽都”。帝尧还派叔和管理幽都，治理北方。

幽、蓟既为古代都邑，方国都会，它就不会是孤立的“邑”或“会”，必有一定范围的辖地。既然“幽陵”、“蓟城”都是北京的前身或“乳名”，其辖域必覆盖有今日北京地域的全部或一部分。考古资料也表明，黄帝及其后裔在今日北京辖域内的延庆、平谷、昌平、北京城西等地都留有行踪轨迹，说明远在 3 000~4 000 年前，北京地区已经处于野蛮时代末期，文明时代的曙光已经出现。

四、现行北京所辖郊区地域状况

北京现行辖区曾是燕国的腹地，春秋战国时期的燕都蓟城是古代蓟国都城蓟的延续和发展。至战国时期，《北京通史》（卷 1：92）写道：“以今北京地区为中心的燕国”凭借“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陀、易水”的优越地理区位，燕文侯时已是“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的强国。从这些文字中似可认知北京现行的地域当是那时燕国都城蓟繁荣的重要腹地。从上列“北京人”迁徙、黄帝及其后裔建立的方国蓟都迁徙、转移、北京辖区曾是燕国腹地的追述中，可见现代北京所辖地域在古代就属“北京人”、“蓟人”、“燕人”所治。之后，现北京所辖的远郊区虽曾属河北省辖，但毕竟与京城唇齿相含，相依关系密切。到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回归北京所辖成为腹地。如今研究北京农村经济史当以现行北京地域（即 10 个远郊区县：通州、大兴、顺义、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房山及 4 个近郊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两个城区：东城、西城，总国土面积 16 807 平方千米）为框架相称，方便于追踪与认可其史实与史迹。

（一）蓟城兴起与发展的地理与社会文化基础今犹在

第一、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自古以来，北京地区即属于暖湿带温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距今 2 500~7 500 年，年平均气温比现今高 2~3℃，降水量在 700 毫米左右。气温与 20 世纪后期以来可能相近；降水量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相差不多。冬季以偏北风、夏季以偏南风为主，风向季节性变化明显。

第二、优越的地形、地貌与土质条件。蓟城坐落在永定河（古称灤水、浑河）洪积冲积扇基部前缘，古代西边太行山与北边燕山交汇于南口形成“北京湾”，湾内远古时期

(距今二三百万年前)是一片海洋，后来渐成陆地平原——北京小平原，南与华北平原相衔接，海拔高度在48米左右。背后山地正是“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及“东胡林人”的活动空间，而东部西向由卢沟桥与潮白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而成的冲积平原，多沼泽洼地与泛滥平原。这种地形、地质至今犹在，质地疏松的黄土及肥沃的土地依然存在。当年为蓟丘坐落的丘阜，今日仍为北京坐落的风水宝地。

第三、丰沛的水源。蓟城坐落的地方，正处于卢沟河洪积冲积扇脊背前缘潜水溢出带的东侧。地下水源丰富，《水经注》中写道：在蓟城邻近有“(高粱)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东注，经燕王陵北，又东经蓟城北……”；“(洗马沟)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蓟县)西北平地，道(导)泉流绕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绿水澄清，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这里所说西湖即现在的莲花池，洗马沟即现在的莲花河，今都犹在，只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长期干旱少雨的影响水源没有古代丰沛而已。

第四、便利的交通要道。蓟所处的中原、东北平原与蒙古草原三大地域单元交接地带的地理区位，形成了宏观地理形势决定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方向的交通线在此辐聚与辐散，形成天然的交通枢纽。古代这种交通格局今亦犹在，并更加开拓。

第五，作为北京城市前身的原始聚落开始发展的时候，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以及松辽平原(或称东北平原)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已存在。一方面是出现于华北平原腹地的中原文化(或称仰韶文化)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传播，首先进入北京所在的小平原，然后再穿越北面的燕山山脉，继续向北山后地区扩散；另一方面，在燕山山脉以北发育起来的有着地方色彩的古代文化(又称游牧文化)，沿着同样的路线向南渗透。再就是东北的“红山文化”通过古北口传入北京古代腹地，北京地区古代文化亦逆向进入东北。于是北京小平原就成为南北及东北三方文化集中接触的地带，并相互融合，形成3种古代文化交融的多元文化。这是蓟城逐渐演化、发展成都会、重镇、国家首都、政治、文化交往中心的底蕴所在。

第二节 郊区生态环境

农村经济的兴衰决定于天地人和三因素是否协调优化，而天地构成农村经济依存与发展的客观环境条件，即天为农村经济活动(尤其是农业)提供光、气、热、水及空间；地为农村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土地、营养和相适的地形、地貌等，是农村经济活动的立足与养生之基。在一定意义上，人在天地间是主宰者，既要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来求获取，又要呵护自然，以谋取可持续发展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研究农村经济史首先要清晰它的环境变迁情况，方可明白人类是如何应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需制宜采用措施来谋取经济发展的预期，在索取的同时付出呵护，维系天地人的协调、和谐。从已有可寻的研究资料中，人们可以看到二三百万年以来环境变化的总趋势是有利干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

北京地区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端，地理坐标为北纬 $39^{\circ}28' \sim 41^{\circ}05'$ ，东经 $115^{\circ}25' \sim 117^{\circ}30'$ 。南北长约176千米，东南宽约160千米，总面积16 807平方千米，山地约占62%，

平原约占 38%。前者称为山地，后者称为平原。两者间由于地形、地貌的差异，其生态环境亦大相径庭，各有千秋。

一、山地自然生态环境

“二三百万年前的北京地区还是一个山与海的睦邻形成的海湾，湛蓝的海水在这里荡漾，与北边的燕山山脉、西边的太行山山脉接邻！”“在最近的一、二百万年的第四纪时期，由于构造运动和气候变迁发生过一系列重大环境变化”，“新生代以来，在北京、西北及近东西向构造的控制下，由于地壳的差异性升降运动，引起了地面有较大幅度的分异，燕山太行山地区处于总体上升，构成为海拔 1 000 ~ 2 000 米的山地和海拔 1 000 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局部地段断陷成为盆地，延庆—怀柔盆地是本区最大的断陷盆地。新生界的厚度达到 2 000 米。全区山脉走向是西面太行山由南向北，北面燕山是东西走向与太行山于南口交汇。这样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步降低。呈现京津连带则在相对下沉，并不断接受松散沉积物的堆积，形成了现今海拔低于 100 米的平原；平原面基本上由西北向东南微倾，平均坡度在 1.2% ~ 1.3%，从山麓至滨海，依次为洪积—冲积倾斜平原、冲积平原，海积—冲积平原和海积平原。山川平原构成“地理形胜”，正所谓：“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由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等共同铸就的面积广阔的洪积冲积扇，西有太行山，北有燕山，在地势上形成了一个“山湾”，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北京湾”。

北京的山地分布在西部、北部和东北部。西部统称西山属太行山山脉，由一系列东北—西南向岭谷相间的褶皱山地组成。北部山地俗称北山，通称军都山，属燕山山脉，由镶嵌着若干山间盆地的断块山地组成，山势朝西北向，呈阶梯状逐渐上升，最后进入内蒙古高原。

按照山地地势及其质地组成又分为中山、低山、丘陵、山地河谷及沟谷等四种类型。

中山，主要分布在西山和北山的深山地区，如西山的百花山、东灵山、黄草梁；北山的海坨山、凤驼梁、云蒙山、雾灵山等地区。总面积 2 289.33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 13.94%。中山带山高坡陡，土壤肥力较高，水分状况良好，人为破坏较轻，大部分地区古代生长着原始森林和后来的次生林及人工林，适宜发展林业生产。北山土层较厚，古时植被覆盖较高；西山自然条件较差，水土流失较重，是远古时期大自然填海营造“北京小平原”的主要冲积物。

低山，主要分布于西山和北山的浅山区。总面积 5 704.14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 34.72%，占山区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低山区植被破坏严重，土层较薄，水分状况较差，水土流失严重。只有靠近沟谷下部，水土条件才较好，是自古以来的干鲜品产区。传承至今的主要知名产品有：房山区张坊镇的磨盘柿、大石窝镇的凌枣、坨里一带的杏、红果等；门头沟区的核桃、京白梨、樱桃等；延庆县的国光苹果、杏仁、八棱海棠等；昌平区的尜尜枣、大盖柿、板栗、苹果等；怀柔区的山杏仁、板栗等；密云县的板栗、小枣、梨、玉皇李等；平谷区的核桃、桃、红宵梨、红果、红杏等。

丘陵，主要分布在房山山前、顺义二十里长山、怀柔与密云水库周围和十三陵水库西南一带。总面积 2 779.76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 1.7%。丘陵一般呈馒头状山丘和垅

丘，海拔150~300米，坡度多为7°~15°，丘体无明显脉络，丘谷交错。一般片蚀强烈，土壤瘠薄，干旱缺水，裸岩时有出露。北山丘陵区主要由花岗岩、片麻岩、火山碎屑岩组成。丘坡较缓，土层厚，沙性重，排水透气性好，利于林果生长；西山山前丘陵多由石灰岩组成，坡丘大，土层薄，植被自然恢复能力弱。

山地河谷及沟谷是居住、生产和交通的重要场所。总面积1 077.52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6.56%，多受构造线控制，水文季节性变幅较大。较大沟谷一般发育有多级阶地，其中，1~2级阶地保存较好，阶面较宽平，多为黄土覆盖，是山区主要粮果产区。这里除了种植果树外，历史上是山区居民从事杂粮——玉米、谷子、豆类等旱作物生产的地方。

北京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从西、北、东三面呈群山环绕，形成北京湾，成为北京抵御冬春季风沙涉及的天然屏障。同时，也是古代防御外患的天然屏障。自古以来除了部分石质山脉外，多数山体及山间盆地、丘陵古时为原始森林和草场。直到辽金以后因大兴土木建设南京、中都、大都和北京城，森林连续遭砍伐，大片山场除局部出现次生林外，多呈荒山秃岭。到1949年，森林覆盖率只有1.3%。山区草场也因长期只放牧不抚养日趋退化。随之水土流失也日益加重。

本地区山区最高处为门头沟区的灵山，海拔2 303米。山地面积约占全市面积的2/3。西山属太行山余脉，由一系列北东南西走向、大致平行排列的褶皱山脉组成。西山的近郊部分苍松翠柏，郁郁葱葱，景色秀丽，与北京浑然一体，被称是北京的龙脉之根。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三：1 675）中写道：“西山内接太行，外属诸边，磅礴数千里，林麓苍黝，谿涧交错，其中物产甚饶，古称神皋隩区也。卢沟、琉璃、胡良三桥，山水所洶，多归其中，其水皆藻绿异常，风日荡漾，水叶遞映，倚阑浏览，令人欣然有欲赋京都之意。”

清·乾隆帝有《望西山诗》曰：“迤逦西峰翠靄侵，紗螭闲凭散幽禁。无心最喜云生岫，得句多因座对岑。黛色烟光相罨画，卧游静赏当登临。晚来兰若僧方定，遥想疏钟度远林。”（同上：1 674）。

王惲雨后看山作：“西山尽日尘土面，一雨晚来膏沐容。霁色最堪图画处，白云零乱点高峰。”（《秋润集》同上：1 675）。

王鏊游西山：“赏心多与宦情违，三载来游一夕归。树下杯行殊草草，水边人去更依依。郊原约略青骢度，天水苍茫白鸟飞。回首青山应笑我，漫将尘土涴苔衣。”（《王文恪集》同上：1 675）。

北部山地总称军都山，属燕山山脉，是夹着若干山间盆地的断块山地，地势巍峨，雄伟磅礴。受气候和新构造运动的影响，北京山区大都植被稀少，切割强烈，基岩裸露。一般而言，自古以来，深山多老林，浅山多经济林即果木树等。山间盆地或山间小平原多为旱作农业。历史上山区人民有“靠山吃山”的经验：一是在山间盆地或小平原种植五谷杂粮；在坡地采用“梯田”、“鱼鳞坑”、“垵子田”等种植农作物；遇到雨季既可蓄水、保墒，还可防止水土流失。二是利用丘陵、坡地营造经济林，发展果品、蚕桑生产。三是“小秋收”，晚秋时节上山采摘野果（酸枣、山核桃、山杏仁），割荆条编织山货，挖药材等；春夏上山挖野菜、放蜂采蜜等；四是开矿。据资料显示，京郊山区有矿产资源67种，

从煤炭、铁、石料到贵重金属都有。从夏商周起本地区就有铸造铜器，西周时即有炼铁、铸造铁器等。山区泉水资源丰富。据水利资料显示，本地在旱季能测到流量的泉共有1 246个，其中，大部分分布在山区县。这个总数是现代调查的结果，但它们的存在绝非是现代出现。它们是地质构造而成的，不会一蹴而就。

傍山依水是“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的发祥地，山区滨河50~100米高台地是本地区原始农业发源地。门头沟的“东胡林人”、怀柔“转年人”，以至平谷“上宅人”都定居在山区临水的台地上。在这里创造石器可以就地取得石料（材）；既有地种，又可避免平原地区遭洪水危害。搞采集、渔猎自救也很方便，既有山野可食植物，又有渔猎的野生动物。这种生态环境对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农业时代，比较适合当时人类生息繁衍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大搞植树造林、养山富民政策引导下，山区已建设成为首都的绿色生态屏障、是首都农业最具后发优势的地区，是发展乡村旅游“招财进宝”的腹地。

二、平原农业生态系统

前面讲到的“北京湾”是由西山与北山交汇形成，湾拥“北京小平原”，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市区海拔43.71米；西北最高峰灵山，海拔2 303米，东南平原最低处海拔不足10米。

北京的平原主要由拒马河、永定河、温榆河、潮白河、泃错河水系洪积冲积作用而形成。

1. 山前台地

平原区隆升的基岩地块，总面积129.05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0.79%，上覆薄层坡残积红土和类黄土堆积，耕层浅，为缺水地区，土地利用以旱作物为主，如谷、高粱、豆类等。

2. 洪积扇

主要分布在西山和北山山前、延庆盆地和平谷盆地周围。总面积1 443.81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8.79%。土质中的砾土质的多辟为农田，沙砾质的多为荒地或采沙、砾场。

3. 洪冲积平原

主要分布于东南部，为平原的主体部分，总面积4 539.86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27.63%，是城市建设及农业生产的主要用地。

此外，还有河床及漫滩，多为荒地，或有绿化造林。平原河道总面积553.34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3.37%；有决口扇及沙丘共有271.96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1.66%。

现今的平原在远古曾是一片汪洋，后经地壳运动，沧海变桑田。但曾因冰封而几无生机。直至距今1 300~11 000年末次冰川消融，气候转暖回湿，河流解冻；此后距今7 500年，气温升高，河流活动加剧，北京小平原乃至华北平原形成泛滥平原及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直至距今2 500年之后气温下降、变冷变干、沼泽渐消亡、泛滥平原演变干旱平原，人类才开始向低平地区扩散（《北京城为什么坐落在这块地方》，《中国地质报》1987.12.18）。